

# 評《內部的鴉片戰爭》

● 賀躍夫

James M. Polachek: *The Inner Opium Wa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鴉片戰爭的衝擊波曾引起崇尚儒家文化的日本朝野的震動，成為激發日本武士尋求維新變革的動力之一。然而在清朝統治階級中所激發的回應卻微乎其微。

鴉片戰爭在中國近代史上無疑是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一個自稱「天朝」的泱泱大國敗在名不見經傳的海外蠻夷之手，這對傳統東方世界來說，的確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因而它的衝擊波曾引起崇尚儒家文化的日本朝野的震動，成為激發日本武士尋求維新變革的動力之一。然而這一本應在中國國內引發政治與文化地震的事變，在清朝統治階級中所激發的回應卻微乎其微，戰後的清政府在意識形態上所堅持的華夷觀念與固步自封的習性依然如故，更談不上在制度方面為適應新的歷史變局進行重大變革。因而，歷史學家常常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鴉片戰爭失敗的

經歷為何沒有使清朝當政者認清新的國際局勢與自身的不足，從而引發對自身制度與文化的反思與變革？

對上述問題，以往的研究所作出的各種解答可簡單地歸納為三類：其一是從晚清保守主義的思想及政治根源來探討，認為中國傳統的華夏中心主義觀念及以朝貢體制為核心的國際秩序，直到1880年代仍為清朝官方奉行的指導思想，觀念的陳舊阻礙了清朝認識到與海上強國競爭的必要性；其二是從戰後中國的社會政治環境來着手，認定鴉片戰爭後各地的社會動亂，尤其是太平天國運動，使清朝統治當局不得不傾全力於國內問題，從而分散了對外問題的注意力；其三則是簡單地歸咎為處於封建社會沒落時期的整個清王朝統治集團的腐敗無能，守舊昏庸的滿清親貴當道，較開明的「開眼看世界」的林則徐等人

受到排擠。翻開各種中外學者關於鴉片戰爭時期的論著，對上述問題的闡釋大體不出以上三種思路。然而1992年新出版的《內部的鴉片戰爭》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答案，著者從幕後的政治鬥爭入手，透過這一時期影響清朝對外決策的各種政治勢力及其紛爭，為我們揭示了一幅鴉片戰爭史的新畫面。

## 一 士大夫群體及其關係網絡

本書描述的主人公是士大夫群體，按著者的定義，「士大夫」是指參與首都政治與文化生活的士人。因舉人以上的人才有資格獲得各種公私資助赴京參加會試，故他們大多有舉人以上的功名。可能具有這一資格的人，不超過兩萬五千人，實際人數則少得多。本書集中探討的集居於北京南城的士大夫群體，約有一千餘人，主要由職位清閒的翰林、候補京官、中低級京官及赴京應試的各省舉人構成。這個群體的最核心部分是翰林、內閣舍人、御使及充當士人政治庇護領袖的官員，他們對京城政治及科舉考試消息靈通，構成吸引新來者的中心磁場。

南城士大夫群體雖然人數不多，但他們提供了一種社會橋樑：一頭連接起外省想獲知京城消息與文化時尚的科舉士人，另一頭則連接起官場的當權人物。他們通過各種私人關係，形成複雜的庇護關係網絡，包括在科舉考試中形成的主考官—門生關係，科場同年關係，

以文會友的文字之交，以地緣為紐帶的同鄉關係等，並繼承明代東林黨的遺風，結社集會，形成較穩固的社交與政治集團。

鴉片戰爭前的一、二十年間，北京南城的士大夫群體已十分活躍。1814年結成的宣南詩社，表面上是士大夫吟詩唱和的文學社團，實際目標則是本社成員相互庇護與幫助，以加強其在仕途的競爭能力，林則徐也曾參與其活動。1827年宣南詩社的核心人物之一蔣攸銛在兩江總督任內因漕運改革失敗而降調，兩年後又因故被革職，宣南詩社的關係網大受其損。但士大夫相互援引、庇護的傳統並未就此中止。當1830年代清朝面臨外交與軍事危機時，林則徐與御使黃爵滋、徐寶善等結成的小集團聯合，抓住時機對清政府的對外政策發揮了重大影響。

士大夫集團靠「清議」來搏取社會與政治聲望，增加其在清政府內的地位，並影響清朝當局的政治決策。道光皇帝在1839年決定嚴禁鴉片，主要就是因來自黃爵滋、林則徐士大夫圈子的清議的壓力所致。而黃、林等人之所以要抓住這一問題，按本書的分析，是出於要在清朝政治體制之內更穩固地建立其權力基礎的合法性的動機。鴉片問題為這些滿懷野心而地位又並不牢固的士大夫提供了他們感到值得一搏的機緣。具體就林則徐個人而言，他的政治意圖也在於謀求提高自己在朝廷中的政治聲望和地位，希望通過完成廣東禁煙而得到兩江總督的職位。

本書開頭的兩章即着力於揭開

南城士大夫群體提供了一種社會橋樑：一頭連接起外省想獲知京城消息與文化時尚的科舉士人，另一頭則連接起官場的當權人物。他們通過各種私人關係，形成複雜的庇護關係網絡，並繼承明代東林黨的遺風，結社集會，形成較穩固的社交與政治集團。

鴉片嚴禁派與馳禁派之爭，不能貼上愛國主義與賣國主義的標籤，它只不過是以黃爵滋、林則徐為首的士大夫集團為了其政治目標而使用的一個砝碼或所玩的一個遊戲。圖為林則徐畫像。



士大夫文學結社、社交酬應及「清議」等現象底下所隱藏着的權力爭鬥的底蘊。其根源在於漢族士人在一個仍由滿人控制的仕途上，具有不安全感，因而往往要藉相互援引與庇護來增強其地位。這樣來看，在士大夫們唱酬集會、慷慨激昂地品評時政的背後，是爭權奪利的權力慾望。故從本書著者的視角來看，鴉片嚴禁派與馳禁派之爭，也不再具有任何道德評判意義，不能貼上愛國主義與賣國主義的標籤，它只不過是以黃爵滋、林則徐為首的士大夫集團為了其政治目標而使用的一個砝碼或所玩的一個遊戲。不幸的是恰好是這種幕後的政治爭

鬥左右了清朝在戰爭中及戰後的對外決策。

## 二 林則徐與主戰派輿論的誤導

被中國史家稱頌為「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近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則徐，在本書著者的筆下成了熱衷於爭奪權力、好大喜功和善於玩弄計謀的官僚。

林則徐在鴉片戰爭前的長期仕途生涯中，注重的是水利、漕運、河工等國內問題，對外交事務並無

明確的目標與綱領，只是為了加強其政治權勢而捲入禁煙爭端。作為欽差大臣到廣東後，他出於搏取政治資本的需要，超出清朝給他指示的範圍，不僅沒收銷毀外商的鴉片，而且試圖採取「具結」等手段，一勞永逸地禁絕鴉片。如此一味採用強硬手段，甚至不惜停止中英貿易，終於使中英衝突升級，導致了戰爭的爆發。

當清政府所最為擔憂的「邊釁」終成事實之時，林則徐成了啟邊釁的罪人而遭道光皇帝的斥責與革職。處在這種境地的林則徐及支持他的士大夫圈子，為了給林開脫責任就製造了大量的輿論：一方面掩飾廣東戰場的真相，另一方面不遺餘力地指責其對手——主和派。英軍的既定戰略目標是長江下游，通過扼住清朝漕運通道而迫使清朝就範。廣東並非英軍的戰略目標所在，因而廣東雖然為戰爭爆發之地，但並沒有被英軍征服。林則徐及其追隨者們卻通過私人通信等各種手段，一面指責清朝官軍無能，一面誇大團練鄉勇的作用。三元里抗英事件就是明顯的一例：這次事件不過使英軍一人死亡，十五人受傷，對英軍來說是一次微不足道，毫不影響戰爭進程的小事件。但通過張維屏、駱秉章等廣東士人及主戰派官員們繪聲繪色的誇大的描述，並通過北京南城士大夫們的宣傳，三元里事件卻變成了一次對英軍的重大勝利，並在士人中廣為流傳。這種誇大廣東抗英運動的宣傳，意在證明英夷並不可怕，並非不可戰勝，他們在江浙得手是因清軍的無能與指揮失當。戰爭中林則

徐基本上還是以過去的海寇來看待英國人，認為英夷貪婪成性，並非為政治目標而戰，只要持久地打下去，使其無利可圖，就可將其制伏。被誇大的廣東抗夷的勝利，似乎為其提供了事實根據。

在誇大宣揚廣東民間抗夷運動的同時，林則徐及其盟友也大力攻擊主和派。最先指責的目標是琦善，其次是奕山，最後指向軍機大臣穆彰阿，把戰爭失敗的責任全部歸咎到他們頭上。1840年冬林則徐被革職，琦善來粵取而代之。次年初北京南城士大夫即竭力為林游說，林及其在廣東的盟友將琦善在廣東的所作所為及時地通報到北京。而在京的黃爵滋等則串通南城士大夫，一時間不下十餘封奏折遞送到道光皇帝之手，嚴參琦善，終使琦善被革職鎖拿解京。顯而易見，即使在主和派當政的時期，主戰的士大夫集團的「清議」在政壇仍是一股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

為幕後政治鬥爭服務的上述輿論，也對戰後對外新認識的形成發揮了作用。主戰派士大夫繼續宣傳諸如三元里抗英運動、姚瑩在台灣的抗英活動等等歪曲、誇大事實的勝利，指責琦善等主和派賣國。同時，魏源在戰後編成的《海國圖志》等書中，還較系統地闡述了林則徐在戰時已指出過的制夷戰略：敵人雖然船堅炮利，但不利於消耗戰術，因其必賴貿易與搶劫來支付戰爭開銷；應攻其弱點，像明代對付倭寇一樣來對付英夷：民心可用，應依賴本地義勇等等。而姚瑩在《康輜紀行》中，則利用他在台灣審訊遇難英船俘虜時獲得的一些關於

三元里抗英事件不過使英軍一人死亡，十五人受傷，但通過張維屏、駱秉章等廣東士人及主戰派官員們繪聲繪色的誇大的描述，並通過北京南城士大夫們的宣傳，卻變成了一次對英軍的重大勝利，並在士人中廣為流傳。

魏源與姚瑩在士大夫群體中享有盛譽，他們所著的《海國圖志》、《康輶紀行》，構成戰後對外新認識的重要知識來源。

尼泊爾、印度的知識，主張利用尼泊爾及印度來制英夷。魏、姚均是當時在士大夫群體中享有盛譽的人，他們的書構成戰後對外新認識的重要知識來源。然而儘管他們的著作介紹了一些新的關於外部世界的知識，但他們所力圖樹立的觀念卻是：沒有新的軍事技術，清朝也能或本應能打敗海上敵人。

說鴉片戰爭完全沒有對士大夫造成震動，顯然是不確切的，事實上戰後士人對外部世界的關注的確增加。但由於上述原因，這種對外的知識熱情並沒有導致對本國文化的自我意識，也沒有引起對那些能使敵人獲勝的軍事與經濟制度的正面認識，反而使人們確信：林則徐本來是正確的，西夷儘管看起來可怕，但並不對清朝構成真實的威脅和挑戰，更不需要為了對付它而變革自身的制度與文化。這樣，戰爭雖然給士大夫們敲了一記警鐘，但其結果卻是更深地把他們束縛在故步自封的思想觀念之中。

### 三 幕後權力鬥爭的延續 與1850年政治變動

1850年，林則徐、姚瑩相繼被咸豐皇帝召回重用，而戰後一直執政的穆彰阿、耆英則被撤職。本書認為，這一重要的政治變動，是新一輪幕後權力鬥爭的結果，並對晚清政治史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以穆彰阿為首的滿清親貴集團在戰後控制了朝政，漢人軍機大臣相繼受到排擠，翰林院也為穆氏所

控制，重要地方督撫大多也為穆的人所充任。穆氏集團的集權措施，加劇了漢人士大夫與滿人親貴集團的矛盾，以穆為首的主和派在朝得勢後不到兩年，就使漢人士大夫完全走到其對立面。原本有學派之爭的士大夫，現在為了反對當朝的穆氏集團而聯合起來。1844年，原來的主戰派士大夫（主要師從桐城古文學派）與崇尚漢學的士大夫在北京聯手，結成顧亭林先生祠會，以紀念顧炎武為名進行聚會，策動反條約運動，試圖倒穆彰阿、扶漢人軍機祁寯藻。

在這場持續數年的權力鬥爭中，漢人士大夫集團之所以能最終獲勝，是由於有兩個對他們有利的政治環境。其一是清朝中央政府軟弱，對地方缺乏有效的控制力，因而穆彰阿集團並不能把其意志有效地貫徹到各省。《南京條約》關於允許英國人進城的規定在廣州就得不到實行，戰後廣州地方士紳一直抵制了英國人的入城要求。至1849年，在兩廣總督徐廣縉的主持下，再一次否決了英國人入城的要求。徐廣縉與北京顧先生祠會的士大夫有密切關係，這種消息被及時的傳到了北京，成為南城士大夫們攻擊極力維護條約的穆氏集團的有力武器。其二是戰後華南及長江流域農村社會動盪不安，也使皇帝要考慮漢人士大夫們的意見，以便爭取他們對鎮壓地方動亂的支持。但穆彰阿當權時，致力於加強中央集權，最關注的是維護中樞的安全，對廣西等邊陲省分的動亂情況不聞不問。廣西地方官上行下效，對鄉村的動亂聽之任之，使社會秩序嚴重



士大夫群體幕後的權力鬥爭，往往左右清政府的政治決策。

失控，至咸豐皇帝1850年初繼位之時，幫會活動已蔓延至廣西全省70%的地區。桂林士紳通過私人途徑將廣西動亂情況通報給北京士大夫，顧先生祠會由此發動了一場向皇帝揭露穆氏集團隱瞞、忽略廣西動亂的活動，成為促使咸豐起用林則徐、姚瑩而撤除穆彰阿、耆英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與通常看法不同的是，本書作者對穆彰阿集團持同情態度，認為穆當政時期代表了晚清政治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這一時期滿清權貴充當了改革的執行者與保護人。為維護和平和建立條約後的新秩序，以適應變化的國際環境，他們進行了諸如加強財政與政治決策的中央集權等方面的制度改革。而在此之

後，清政府摒棄了前一階段積極參與和促進改革的態度，逐漸變為在很大程度上敵視改革的力量。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有二：其一是60年代後的自強運動的指導者，主要是來自處於權力邊緣的漢人官僚，尤其是在軍事領域。漢人軍事領袖在1860年後使用西式武器平定各地叛亂所獲得的戰爭經驗及擁有的新式裝備，已足以對滿清的旗兵構成威脅。因而清朝統治者在1870年後越來越傾向於阻止軍事的進一步近代化，力圖限制軍事改革的程度。其二是1850年後朝廷越來越轉向從士大夫輿論中尋求其自身權力合法性的基礎，以獲得士大夫群體在政治上的支持，因而認同了士大夫反西方的保守主義。尤其是在慈禧當政

與通常看法不同的是，本書作者對穆彰阿集團持同情態度，認為穆當政時期代表了晚清政治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這一時期滿清權貴充當了改革的執行者與保護人。

時代，朝廷一方面利用保守士大夫的清議來非難、抑制奕訢的反儒教傳統的革新措施，另一方面通過動員士大夫的傳統主義，抑制新興的掌握近代軍事設施的洋務官僚們。

從上述線索來看，本書著者認定，顧先生祠會集團在權力鬥爭中的勝利與穆彰阿集團的倒台，在晚清政治史中不是一個政治進步，而是一個倒退。

#### 四 文化沙文主義

從以上勾勒出的本書的基本觀點，已不難看出著者是從揭開幕後的政治權力鬥爭入手，以揭示這些幕後的鬥爭如何影響了鴉片戰爭時期清朝的對外決策乃至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本書成功地將士大夫群體的政治計謀、學派爭論、地方士紳的抵抗運動、內亂等等，與清朝的對外決策聯繫在一起，把鴉片戰爭置於中國國內的政治環境中加以透視。由此我們不難理解著者使用「內部的鴉片戰爭」為書名所包含的意義。但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中，著者還告訴我們，「內部的」一詞還包括另一層面的意思，即著者着力探求的驅動士大夫們政治行為的深層心理動因。

從政治動機層面來看，著者認為是國內政治目標意識形成了本時期士大夫政治行為的前後一貫的向導。本書之所以從嘉慶年間出現的宣南詩社寫起，就在於試圖說明早在中外關係出現危機之前，南城士大夫的清議既已形成。他們關注的是內政問題，主要政治改革目標是

地方分權(加強地方行政管理與財政自主權)和御使們的言論自由。而致力於加強中央集權的穆彰阿集團的得勢，使這些內政目標無法實現。這樣來看，對外政策的爭端不過是士大夫群體為實現其內政目標而打的一張牌。

從更深的心理層面來看，著者認為在漢族士大夫中存在着一種他稱之為階級或文化沙文主義(class/culture chauvinism)的意識。這是一種士大夫自以為是的群體意識，他們相信漢族士大夫比滿族親貴更能清楚地判斷哪裏需要改革和怎樣進行改革，並堅信士大夫師友紐帶作為政治復興力量的價值。簡言之，這是一種群體的只有自己能行的自我中心主義的意識。因而他們往往不顧其政策問題是甚麼，而盲目地支持在政治上失勢的翰林元老，不論是非地反對滿人親貴。尤其是當主戰的漢族士大夫領袖在鴉片戰爭中受挫時，士大夫們受到傷害的階級虛榮心，使他們對條約體系懷有特別的敵意。這種心理因素是士大夫政治行為的「最內在的」(innermost)驅動力。本書書名中的「內部的」一詞，正包含着「國內的」與這種「最內在的」雙重意義。

無論是否贊同本書的觀點，讀過該書的讀者一定會同意這是一本既立論嚴謹，又寫得引人入勝的好書。著者窮八年之力，廣泛收羅了美國、英國和台灣等地的公私檔案、原始文獻及有關人物的詩文集等，揭示和澄清了不少基本史實，而且通過私人詩文、信牘等，理清了這一時期士大夫群體內部複雜的關係網絡及其互動的途徑等，反映

在漢族士大夫中存在着一種階級或文化沙文主義的意識。他們相信自己比滿族親貴更能清楚地判斷哪裏需要改革和怎樣進行改革，並堅信士大夫師友紐帶作為政治復興力量的價值。

了當代史家對歷史研究精細化的追求。更為重要的是，本書提供了一個考察近代中國對外政策形成的新視角，為我們展示了常被忽略的幕後圖景。著者善於將北京士大夫群與地方官僚及士紳，學術之爭與政治問題，私人關係網與政治鬥爭，內亂與外交等等問題聯繫在一起，進行多層面的交叉透視，為讀者展示一幅頗具深度與力度的多維的歷史畫卷。

還值得稱道的是，本書善於提出一連串發人深思的問題，並逐步加以解答與展開，尤如剝竹筍一般地將本書探討的主題引向深入，這是本書讀來引人入勝的原因所在。不過在本書提出的問題叢中，著者似乎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一些本應加以闡釋的問題，如與林則徐、魏源等士大夫相比，穆彰阿、耆英等滿族親貴是否更開明？穆氏當政十餘年間的政治實踐表明，除了被迫開五口通商外，他們在內政外交方面並無積極的建樹。因而若無1850年的政治變動，穆彰阿集團能繼續當政，清政府能成為一個致力於近代化變革的強有力的權力中樞嗎？此外，對外政策與國內政治往往是分不開的，重大對外政策的轉變伴隨着激烈的國內政治爭鬥的事例，在近代世界史上屢見不鮮。以差不多是同一時代的日本為例：明治維新前的攘夷與開國之爭，是和尊王與公武合體的國內政治權力之爭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後來成為維新派的武士集團，起初恰恰是主張尊王攘夷的，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們在與西方更多的接觸後迅速認清國際局勢，走上維新之路。中國的內部權

力紛爭為甚麼必定會導致反近代化變革？晚清士大夫在權力鬥爭中懷有恐懼、嫉妒、野心和憎恨等，這些情緒或許誠如本書所述，會成為他們政治行為的驅動力。他們所具有的地位意識或文化沙文主義，也可能會使他們盲目地、不顧是非地抵制滿人權貴。但慾望與動機的卑劣與否，並不規定歷史發展的方向，因而上述種種就一定導致全體士大夫趨向反對中國近代化變革嗎？相對而言，士大夫作為政治信息最為靈通的知識精英，是最有可能認清國際新局勢的群體，那麼除了爭權奪利的政治鬥爭外，還有甚麼因素阻礙了他們對外部世界的探求與對本國文化及制度的反省呢？

本書所闡述的對鴉片戰爭史的「修正」觀點，對很多中國的史家來說恐怕是難以接受的，惟其如此，它可以促使我們反省自問：在主要採用漢族士大夫的記述來研究鴉片戰爭史時，我們的潛意識是否也繼承了這些前輩知識精英所遺傳的「文化沙文主義」的基因？自然，我們也可以質問本書的著者，他之所以同情主和派而貶主戰派，是否也是因為繼承了西方中心論的文化偏見？

賀躍夫 湖南沅江人。1989年留學日本。1992年獲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該校歷史系副教授。曾發表論文多篇，譯有《出國華工與清朝官員》一書（合譯），另將出版博士論文《晚清士紳與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

著者似乎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一些本應加以闡釋的問題，如與林則徐、魏源等士大夫相比，穆彰阿、耆英等滿族親貴是否更開明？我們也可以質問本書的著者，他之所以同情主和派而貶主戰派，是否也是因為繼承了西方中心論的文化偏見？